



文史哲博士文丛



传统与近代之间

——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

● 王军伟 著



齊魯書社

传统与近代之间

——晚清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

■ 刘晓伟

K827=52
W237

传统与近代之间

——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

● 王军伟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近代之间：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王军伟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4. 8

ISBN 7-5333-1389-5

I . 传… II . 王… III . ①梁章钜—学术思想—研究
②梁章钜—文学理论—研究 IV .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735 号

传统与近代之间

——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

王军伟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389-5

K·415 定价：20.00 元

序

蒋 凡

1999年秋，军伟君暂别讲席，跨进了复旦大学校园，专心致志攻博三年。在此期间，我有幸和军伟君等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共商学问，切磋文章。古人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此乃千古名言。在人生的学习道路上，教学相长，师长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也从青年学生的身上，感染了意气风发的生命热情，并因此而一扫身上残存的暮气，隐约看到了未来的美好和希望。现在已是几年过去，军伟的大著《传统与近代之间——梁章钜学术与文学思想研究》手稿，已沉甸甸地捧在手上，作为第一读者，一气呵成，先睹为快，读后不禁浮想联翩。

记得军伟刚进校时，可能是因为生疏的缘故，讷于言而敏于行，讨论决定要做的事情，行动干脆利落，安排得井井有条，令人放心。但在切磋讨论时，却不为天下先，谦让师弟师妹先发言，自己大多是“后发制人”，不发则已，言则屡中，表现出深思熟虑的思考，其成熟早已超越了学生的阶段。平时，在其师兄弟中，又因行仁仗义、排忧解难，被戏称为“掌门师兄”。他把周围同学的困难，当作自己的事情，以全副心血投入，化解矛盾于无形。以此团结了同学，并获得了广泛的

信任与支持。其学习阶段的道德文章，早已蜚声校园而颇孚众望。在校如此，相信走上社会，也会一如既往地勇敢直前。这为其严谨治学，做了良好的铺垫。

军伟攻博的三年期间，正值新、旧世纪交替而万象更新的时代。在学术界，总结成就、回顾过去与前瞻未来，成了诸多学术热点。于是现代学术转型与现代反思的问题，立即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军伟的这部著作，也就成了时代的弄潮儿——投身于这一时代主潮，并构成其中一朵积极的浪花，滚滚向前。

军伟原习中国现当代文学。但踏进复旦校园，却改行转向了古代及近代文学的学习。他必须为改换专业方向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放弃熟悉的环境门径，在一片陌生的天地中重新摸索耕耘，其辛苦可以想象。但他义无反顾，因为他有自己的深刻思考。一个研究或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如果仅仅就现代而论现代，而不以古代和近代文学研究及西方理论发展作比照参考，取消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眼光，这样一来，相信其学术视野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许多隐藏在现象之后的本质精神就很难被发现并挖掘出来。不见本质，又怎能为现当代文学的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呢？正因为有此深刻认识，所以军伟在攻博期间，敢于改变自我，开辟新战场，以便为将来的现当代研究做基础深厚宽广的大模样的蓝图规划。

《传统与近代之间》，具体研究的是清代梁章钜的学术与文学，这是典型的历史个案研究。但是，其学术眼光之深邃在于通过具体而微的生动个案，解剖麻雀，从而为近代学术及文学的转型，描绘出清晰的变化轨迹。因此，选择这一课题，可见作者良苦用心。这不仅因为梁章钜的学术著述非常丰富，涉及

了学术与文学的方方面面。仅就作为一个笔记大家来说，其著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实属罕见。若单独提出其属于古代诗文评类的诗话著作，现存就有《长乐诗话》六卷、《南浦诗话》八卷、《东南峤话》十卷、《三管诗话》三卷、《闽川诗话》不分卷（残）、《闽川国秀诗话》四卷、《乾嘉全闽诗话》十二卷、《读渔洋诗随笔》二卷、《雁荡诗话》二卷、《退庵随笔·学文·学诗》三卷、《浪迹丛谈·诗话》一卷，另有存目佚传的《读随园诗话随笔》二卷，共十二种之多。另外，如其《楹联丛话》及《试律丛话》中有关诗歌文学的讨论，言其实质，也当与诗话相近。其诗话著述之富，有清一代，世罕其匹。上述诸多诗话，虽然质量不一，但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即就其已佚的《读随园诗话随笔》而言，当日诗坛的正统之论，无不批评袁枚《随园诗话》“非邀誉达官，即艳称闺媛”，抨击几无完肤。但梁章钜读后，却能独立思考而一扫传统偏见。军伟称引梁氏《退庵文钞》（仅存上海图书馆稿本）中的《随园诗话序录》云：“见其中标隽之言、持平之论，实有足以砭讹订惑、启发后生者，乃知先生之独契精微，唾弃凡近，金针之度，具见编中。余生也晚，未获接先生馨教，而先生之书则无一不寓目。及之官江南时，以事小住金陵，曾寻随园一览，有诗云‘六代风骚到此园，过江坛坫半推袁。只今饱看林泉好，其学其人且漫论’。时吴门耆旧见此诗者，皆以为蕴藉恰好。及兹反复是编，乃知昔之知先生也尚浅，□□以随声附和，没先生提倡之盛心。因费旬余日之力，精取若干条分为上下两卷，以质当代之学诗者，当不以余为无知妄作也。”其取于自我反省的真知灼见，正见梁氏实事求是而非随人脚跟的批判精神。仅就诗话写作，已可见其巨大学术贡献之一端。研究梁章钜，应

说是填补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空白。又如梁氏《师友集》中，很有感情地提到了刘逢禄、龚自珍、林则徐、“雁蕩诗派”及其《昆陵舟中有怀邢上诸君子》诗，又清楚地记录了他和“门下士”魏源的交往。上述诸人，均为近代启蒙开风气的人物，其思想学术，在当时具前沿性，但作为一个传统士人，梁章钜却能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支持。军伟称述这些史料，清楚地说明了梁氏学术与思想，处于新、旧之间，梁氏已实际感受到大清帝国及传统学术思想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和压力，他虽然一时无法摆脱传统的拘束，但在沉重的时代车轮叹息声中，一个正直的学者，时而翘首以望，时而侧耳倾听，正在细细分辨那渐行渐近的近代巨变脚步声响的分量。

《传统与近代之间》，在史料丰富翔实而又充满理论思辨的个案研究中，读者透过传统的帷幕，正思考着怎样来迎接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作者企望踵武启蒙时代而作深刻的现代反思，从而给人以有益的启迪。这就是我们讨论近代学术转型的用心所在。广大读者以为然否？

2004年6月19日
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

引　　言

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前江苏巡抚、并曾一度兼署两江总督的梁章钜在温州其子的寓所中去世，除了老友林则徐在匆忙中给他作了篇墓志铭外，他的去世在帝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动静，时局的动荡使他身后倍显寂寞。

章钜（1775—1849年），字闳中，又字茝林（或作“芷林”），晚年自号退庵。其祖系出安定梁氏。原籍福建长乐县，居南乡江田里，清朝初年才迁居福州，所以有时又自称是福州人。梁家在当地属清望之族，父辈以前梁家虽少达宦，但从前明至本朝，曾连续十四世为诸生，以致纪昀督学福建闻听此事后，欣然题匾“书香世业”，以为光宠。章钜之父梁赞图，字斯志，又字翼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举人，曾考补内廷咸安官教习，调选汀州府宁化县学教谕，在其严格教育下，章钜自小收获良多。

嘉庆七年（1802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梁章钜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终于如愿以偿地中了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用教习，散官授礼部主事。后入直军机处，外任荊州府知府，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管理盐运漕粮总局，江苏、江西按察使，山东、江苏布政使，在两江总督蒋攸铦保奏下护理江苏巡抚。后引疾归里，再起时授甘肃布政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升

任广西巡抚。在任时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曾率兵前往梧州防区堵英人。二十一年升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裕谦兵败自杀后，署理两江总督，后以疾退。

在清代，不少身居高位的帝国重臣，往往又是引导时风的学者。章矩少时即慕著书之名，入仕前，曾辑《东南峤外书画录》；通籍之后更勤于著述，据其《归田琐记》卷六《已刻未刻书目》载，七十岁以前或纂或著之书已有41种——而他自己提供的这份作品清单，其实尚有不少遗漏。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年头仍有所著述，据林则徐撰《墓志铭》称，其著作有67种之多。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章矩著述颇丰，但若称其为嘉、道时期第一流学者，也与实情不符；今日重新提起他，主要原因是他独特的身份、经历以及由此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特点。

众所周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即开始由闭关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不过任何一种转变都有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之前嘉、道时期的时代风貌，对此后的转变所起到的潜在作用，实在不可低估。梁章矩主要生活在中国社会将变未变的这段时期，其仕宦生涯——由礼部主事渐至两江总督——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颇深；其师友交往——既与传统文人纪昀、翁方纲、阮元往来亲密，又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关系非同一般——使得他的思想处于新旧之间，打上了这段即将转变的社会所特有的鲜明的时代烙印。通过对他的考察，实际上可以窥见嘉、道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前夕所具有的独特心态，因而梁章矩虽非一流学者，但其地位以及意义却不能忽略不计。可惜的是，对他的研

究却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状态。

最早的评价当属为梁章钜著作所作的序言，如翁方纲、叶绍本、郭麟、董士锡、沈涛、陈若霖、吴慈鹤、陈寿祺、杨文荪、蒋攸铦诸人在为《退庵诗存》所作的序中，对梁氏评价都很高。当然，这中间因为朋友、师生的关系，推许太过抑或有之。之后较为重要的评价来自谢章铤、陈衍诸人。不过谢氏认为梁氏的著作有剽窃之嫌，如《文选旁证》乃强取其师林茂春之作。章铤对其师之说当然有所接受与采纳，这一点他在本书刻印时所作的序言中已有说明，但谢氏对此仍未放过，不免有意气用事之嫌——谢氏与张际亮乃好友，张际亮又是陈寿祺的弟子，而梁章钜与陈寿祺两人关于重修《福建通志》修怨颇深。陈衍对梁章钜的评价也主要集中在对梁氏著述的评价上，不过较之谢氏要平和得多，他在《石遗室书话》中，对梁氏重要著作也有所评价，但对怀疑之处，只是存其说而已，并没有贸然乱下断语。

今人研究梁章钜的重要论述仅有数篇，如袁行云《梁章钜著述多非自撰》（《文史》第十九辑），该文沿谢氏余绪，对梁氏重要学术著作如《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论语旁证》等都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均非出自梁氏之手。平情而论，其结论略嫌主观，如谈《论语旁证》时，只是上文认为《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乃别人代辑之作，就认为它“亦不似梁自撰，但不悉出于谁氏”，中间却没有任何考证，这似非公允的态度。黄保万《林则徐与梁章钜早年关系及其学术文化述略》（《福建论坛》1986，6）对林、梁二人早年的关系有所论述，但对梁氏的思想却未及详细展开。蒋凡师《〈三管诗话〉校注》以及2001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东方诗话国际会

议”上所宣读的论文《关于编纂梁章钜诗话著作全编之设想》，对梁氏的生平、思想、作品进行了全面梳理，本文即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以思想史为背景、以师友交往为切入点，对梁章钜进行全面研究，旨在通过寻绎梁章钜学术及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来展示嘉、道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期所特有的精神面貌。

个人思想的产生主要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要了解梁章钜的思想状况，必须对作为其出生地的闽省之风俗有所了解，而且，闽省地方学风与帝国主流思想之间的发展并非一致，因此对宋学如何成为帝国主流思想并在福建地方通过逐渐的渗透而取得优势，必须给以适当篇幅的分析。鉴于李光地在帝国的独特地位、在闽省学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对闽省后人（包括梁章钜）的榜样作用，因之，李光地的思想及其影响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剖析。对梁章钜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宋学观念，而这同具备宋学知识背景的父辈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以此而展开的影响研究就显得合乎情理了。当汉学在帝国逐渐成为显学的时候，福建还沉溺于原来的宋学思想中，所以第三章叙述章钜由福建地方进入帝国学术中心后，因视野的变化而给他思想带来的巨大变化即宋学为本、汉学为用的调和观念。在诗文思想中，这种调和观念又表现为对传统诗教的回归；在为宦生涯中，它又表现为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关注，此即随后三章所要论述的内容。

师友交往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文人文化品格乃至思维模式的形成？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虽然中西文化史上都曾存在对遗世独立的天才的赞扬和尊重，但这种崇敬更多的来自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幻想，而不是理性分析。事实上无论

但丁或者是尼采，都不能脱离开时代所决定了的他的家世、教育、个人经历以及文化空气。地域和文化氛围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早有所强调。到了当代社会学家那里，主体身份——包括趣味、自我意识的产生与形成，就被更多地是由社会因素决定而非个体的自发成长所决定的。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也认为自我认识并不能通过对自我的内省而获得，而是需要通过对自身的前后左右的关照才能达到，即通过观察与分析自我成长的外部环境及其显与隐的社会功能才可获知。对自己的认知因此不是内省的结果，而是某种客观量化的结果：没有谁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坯子，与众不同的天才的产生，与他出生的时间与地点、父母的职业，还有他的成绩单诸如此类并不算高尚的外部因素关系甚大，主体的形成并非心理冲突的结果。^① 以此看来，对研究者所处的具体历史变化空间的细致考察，应该是不可缺乏的基本工作——此之谓“立论可以深远，叙述不妨细致”。

^① 张宁：《法国知识界解读布迪厄》，《读书》，页 32，2002 年第四期。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闽省学风与鳌峰书院	1
第一节 闽省前贤	1
第二节 书院掌教	12
第三节 先儒遗书	23
第二章 早期经历与思想	43
第一节 巾卷世家	43
第二节 早年师友	58
第三节 修志风波	73
第三章 学术观念之转变	93
第一节 汉学渐兴	93
第二节 出闽之后	106
第三节 考证之作	116
第四章 集部著作考	125
第一节 别集、总集类	125
第二节 诗文评类	144
第五章 经学背景中的诗文观念	174

第一节 宣南诗社.....	174
第二节 草溪门下.....	181
第三节 诗以言教.....	192
第六章 传统与近代之间.....	203
第一节 调和背后.....	203
第二节 经世致用.....	214
第三节 晚年之作.....	221
结语.....	254
附录 《退庵自订年谱》补释	256
参考文献.....	324
后记.....	331

第一章 闽省学风与鳌峰书院

第一节 闽省前贤

关于历史，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连续不断的个人际遇来处理，所以对后人来讲，那些先贤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心——地域风尚之一代代延伸与演变，其实主要就是直接或间接缘自这些先贤的行为和榜样。清高宗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 年，梁章钜出生于帝国理学重镇福建省城福州城中，此时大清开国已有 130 余年，在帝国早期发展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闽省先贤虽早已故去，但由他们开创的风气却依然是地域风尚之主脉。

要想述及闽省早期思想史，不能忽略的人物是李光地。光地是圣祖眷遇之人，终其一生，他都处于朝野舆论之中心，其成名史实也是一部斗争史，概略可见全祖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

榕村在圣祖、世宗实录中应有传，外间未之得见。然实录亦不甚详于学术也。榕村之学术，即其相业，可以想见。倘谓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坠绪，则梼昧无知之言也已。榕村于明儒中稍立门户者，皆加力诋。其于同里，尤诮石斋，具见其语录中。其从弟广卿，尝为述其言曰：“石

斋之人则经也，其书则纬也。”予笑而答曰：“君家相公之书，其貌则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广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斋虽遭大用，岂足靖天下之乱？”予谓石斋风节有余，干略诚然不足，但榕村承眷之久，所以补天下之治者几何？以是诮石斋，得无有目而不见其睫者乎？榕村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其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大儒固如是乎？卖友一案，闽人述之，过于狼籍，虽或未必然，而要其暧昧之心迹，至不能自白于清议，则亦约略有惭德矣。夺情一案，有为之辨者，谓前此昆山徐尚书深好榕村之进用，谗于圣祖，言虽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长左迁瓯使，故榕村惧甚不敢更乞归。但昆山虽忮，愚谓圣祖之时，不应有此，恐出榕村文过之口。外妇之子，其一以游荡殒命京师，其一来归承祧。何学士义门，其弟子也，亦叹曰：“学道人乃有是，其余则未易殚述。”吾乡陈大理心斋，尝令漳浦，以为所苦莫如相门子弟应接不暇。故予尝谓石斋之学，即万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数者，则闽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斋之不为，斯则榕村有所不及也。虽然，此犹以其躬行言之。即以其经术论，惟律吕、历算、音韵，颇称有得，其余亦不足道。而以筹算言图书，则支离之甚者。言互体更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明文前选之精，曰：“一乡一国，士子有能熟于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灾。”呜呼！相公纸尾之学，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尽在于此。然则固免国制举之本领耳。晚而取欧罗巴之技术，自夸绝学，以为是月窟天根之秘也，石斋恐不免嘻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于其门墙之盛，争依附